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文化史

冯天瑜 杨华任 放 编著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文化史

冯天瑜 杨 华 任 放 编著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本书在中国文化的四个层面中更注重观念层面及其物化形态的叙述,以“小文化”为主线,加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归纳,彰显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化主潮;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历程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凸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采用文化生态论、特质论等相关理论,增补夏商周断代工程、郭店楚简研究等新成果;体例新颖,化繁为简,便于教学。本书适于高校文科通识课及历史学专业课教学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 / 冯天瑜, 杨华, 任放编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ISBN 7 - 04 - 015299 - 1

I . 中... II . ①冯... ②杨... ③任... III . 文化
史 - 中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467 号

策划编辑 于健航 责任编辑 于健航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 - 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0 000 定 价 21.70 元
插 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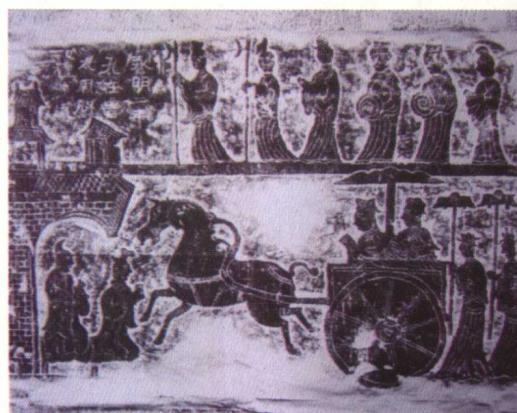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5299 - 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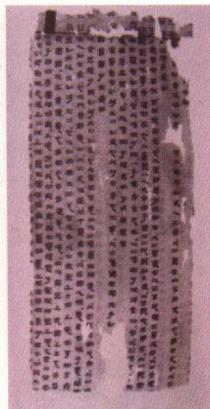


铭文中“中国”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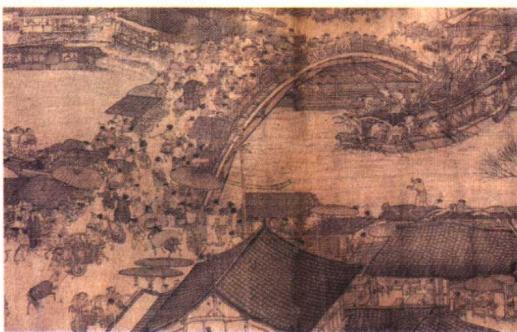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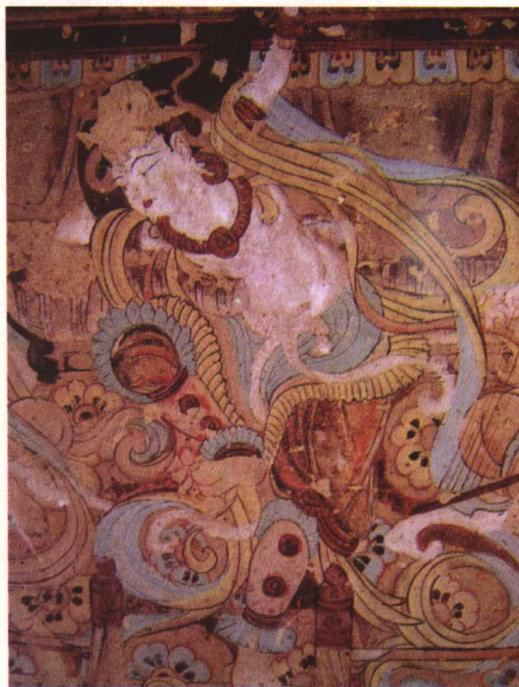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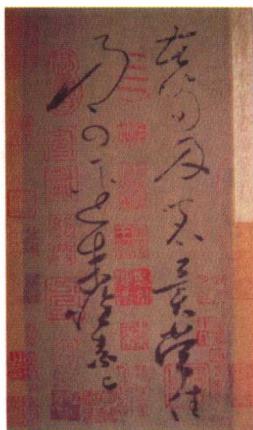
| | |
|---|---|
| 1 | 4 |
| | 5 |
| 2 | 6 |
| 3 | |

- 1、新石器的蚌壳龙虎随葬堆塑（距今约 6000 年）
- 2、殷墟出土涂朱牛骨卜辞（武丁时期）
- 3、鎏金青铜面具（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 4、铸有“中国”一词的何尊（西周早期）
- 5、周公及西周宗法图
- 6、孔老问礼画像



| | | |
|---|----|-------|
| 7 | 10 | 11 |
| 8 | | 13 |
| 9 | | 14 15 |

- 7、战国竹简本《诗论》（现藏上海博物馆）
 8、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9、秦始皇陵兵马俑
 10、汉初帛书《周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11、“五经”文本
 12、晋朝王羲之《兰亭序》
 13、南朝鼓吹画像砖
 14、伏羲女娲绢画（高昌故城出土）
 15、唐代侍女弈棋图



16、唐律残片

17、敦煌壁画反弹琵琶图

16 | 18

18、唐代怀素草书

19

19、北宋《清明上河图》(局部)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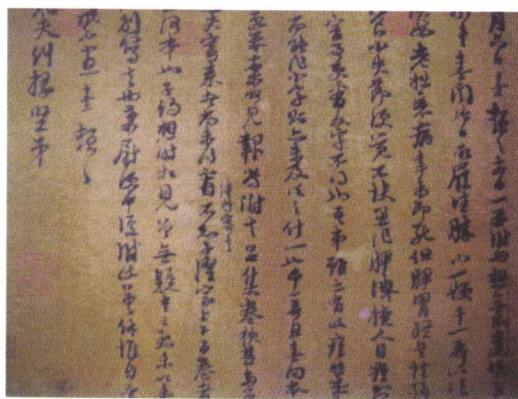
20、宋墓彩绘砖雕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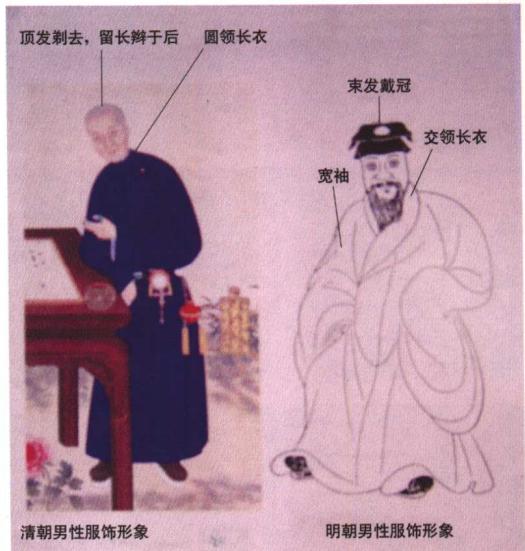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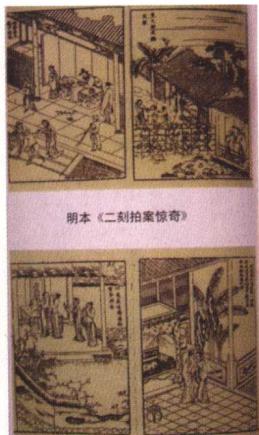


| | |
|----|----|
| 21 | 23 |
| 22 | |
| | 25 |
| 24 | |

- 21、宋代泥活字版（模型）
22、元代活字架（模型）
23、岳麓书院
24、宋徽宗书画
25、辽代契丹文字·银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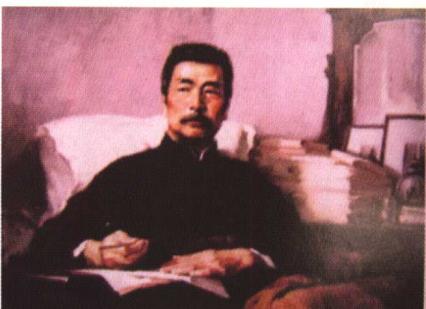
- | | |
|----|----|
| 26 | 30 |
| 27 | 31 |
| 28 | 32 |
| 29 | |
- 26、南宋朱熹行书文稿
27、南宋耕织图 A
28、南宋耕织图 B
29、关汉卿及元曲《窦娥冤》
30、马可·波罗
31、元代简仪
32、《永乐大典》



- | | | | |
|----|----|----|--|
| 33 | 34 | 37 | 33、郑和行香乞海碑（泉州） 34、明本《二刻拍案惊奇》 35、明代长城 36、刻在木栏板上的家规（明代） 37、利玛窦与徐光启 38、明清男性服饰对比 39、清代八旗军服 |
| 35 | | 38 | |
| 36 | | | |
| 39 | | | |



勸君莫治外國事
西洋名學家擇善而從者有矣
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趣者請曉矣
家語言之甚小斯言也甚大故曰今
深而微矣易也夫聖達文者
而能者而能者大矣微言也古之人深半
其體力而淺言一譬也有淺底士而知之
者少之古者人前宗而後聖固皆有其兩方
此由來自古所重之才故嗚乎聖儒皆
自以人為古之書而小以人為學也古人所
謂之立德立功立言美譽歷久
而無窮也惟其立德立功立言者固當風
流傳耳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 錄自生平
魯迅



40 42 43

41

44 46

45 47

40、中英《南京条约》抄件（局部）

41、京剧艺人“同光十三绝”画像（局部）

42、严复及其手书《天演论》序

43、京师大学堂匾

44、孙中山书“天下为公”

45、《新青年》杂志

46、鲁迅及毛泽东手书鲁迅诗句

47、中国和平崛起

目 录

| | |
|----------------------------------|-----------|
| 导论 | 1 |
| 一、释“中国”..... | 1 |
| 二、释“中华民族”..... | 6 |
| 三、释“文化”·“文明”..... | 9 |
| 四、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 13 |
| 五、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 14 |
| 六、中国文化特质 | 20 |
| 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 22 |
| 八、中国文化史分期 | 25 |
|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 32 |
| 一、中国人的起源 | 32 |
| 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 35 |
| 三、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 38 |
| 四、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 42 |
| 第二章 青铜时代 | 47 |
| 一、文明的初现 | 47 |
| 二、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 51 |
| 三、文字的早期形态 | 53 |
| 四、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 55 |
| 五、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 57 |
|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 60 |
|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 60 |
|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 62 |
|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 66 |
| 四、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 | 73 |
| 五、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 77 |

| | |
|-------------------------------|------------|
| 六、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 79 |
| 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 | 84 |
| 一、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 | 84 |
| 二、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 88 |
| 三、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 92 |
| 四、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 95 |
| 五、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 | 99 |
| 六、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 102 |
| 七、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 105 |
|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 110 |
| 一、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 110 |
| 二、玄学与魏晋风度 | 114 |
| 三、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 116 |
| 四、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 119 |
| 五、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 | 123 |
| 六、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 128 |
| 七、科举制度 | 135 |
| 八、文史自觉 | 138 |
| 第六章 近古文化的定型 | 144 |
|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 144 |
| 二、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 147 |
| 三、文化的雅化 | 154 |
| 四、俗文化的展开 | 161 |
| 五、文官政治的确立 | 163 |
| 六、文化中心的南移 | 166 |
| 第七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 169 |
| 一、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 169 |
| 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 172 |
| 三、元曲的兴盛 | 174 |
| 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 179 |

| | |
|------------------------|------------|
| 第八章 晚期帝国文化 | 187 |
| 一、古典文化的集成 | 187 |
| 二、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 193 |
| 三、理学的嬗变 | 195 |
| 四、启蒙新声 | 201 |
| 五、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 | 205 |
| 六、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 209 |
| 七、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 212 |
|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 218 |
| 一、经世实学 | 218 |
|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 223 |
|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 | 226 |
| 四、从“维新”到“革命” | 229 |
| 五、五四狂飙 | 232 |
| 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 235 |
| 七、文化论争 | 238 |
| 八、汉字改革 | 242 |
| 九、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245 |
| 结语 中国文化的发展节奏与去向 | 248 |
| 插图资料来源 | 252 |
| 后记 | 255 |

导论 //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而其内涵在近现代发生了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西交汇的产物，诚如陈寅恪 1936 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基本特性和历史分期，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匚”，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匚”（音围）表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①、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②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

^① 《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 《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①；二如国境之内^②；三如中等之国^③；四如中央之国^④，等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之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⑤唐朝的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云：“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⑥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⑦，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后来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含义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战国时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⑧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含义赋予了某种开

^① 《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② 《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夙于中国，夙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

^③ 《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

^④ 《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⑤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⑥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8页。

^⑦ “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

^⑧ 《史记》卷43《赵世家》。

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①。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伊朗）、“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②。明清沿袭此种“内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

^① 韩愈：《原道》，前引《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页。

^② 《元史》卷208《外夷传一》。

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中国”便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 17 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沙皇俄国以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1662—1722)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 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 19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①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 8 月 29 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②。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第 445、450 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0—33 页。